

华夏几千年悠久的历史,博大精深,地域划分也同样有着很深的渊源,像我国很多地名都是由古地名延续下来的,到现在人们看来都会产生误解,比如“陕”。陕西作为我国古代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,它的名字由来可以追溯到西周,很多人肯定对“陕西”也有很多疑问,为什么没有“陕东”呢?现在的“陕县”和陕西又有什么瓜葛呢?

历史上确实有过“陕东”。“自陕而东者,周公主之;自陕而西者,召公主之。”——《左传·隐公五年》

现在,在三门峡市文物陈列馆,我们依然能看到一块柱形界石,叫“分陕石柱”,也叫“周召分界石”。这块“分陕石柱”告诉我们,在西周时期,就有了“陕”的称呼,并且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,将“陕”这块区域分成了陕西和陕东两部分。先秦时期,夏商周三朝鼎立,各地实力都不一样,当时的状况并不是周灭了商、夏,他们当时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和谐。三朝就是共同存在的三个文明部落,他们各自发展。只是随着各自实力的上升,三者当中渐渐有了差距,最后周比商、夏强大了许多,而且在周边还有许多独立的小部落存在,他们的游戏规则是:哪个部落最强,就能够成为龙头老大。

因此,当周朝发展起来的时候,包括商在内的其他部落,自然开始以周为马首,就这样,周朝开始了统一天下的局面。只是当时的文化发展有限,对于统一华夏的认知显然受限。周朝在成为马首之后,并没有着手去控制其他几个部落的经济、权利,而是继续之前的游戏规则。在秦朝以前,依然有着“兴灭国,继绝世”的说法,也就是说即便商朝意义上已经被打败,归附周朝,但是周朝的当局者是不能让商朝以前的贵族灭绝的,还得按照分封制的礼法,让他们依然有地方生存,甚至还能拥有军队。所以,历史上纣王儿子武庚的封地依然被保留,当时的殷商遗民还因此欢呼不已。

有了这个游戏规则,周朝在统一之后,事实上领土面积扩大了许多,可是在统治上却颇为费劲,因为其他封地依然是之前的遗民,在忠诚度上大打折扣。可想而知,周朝当时统一管理并不轻松。在灭商四年后,周武王去世,继位的周公旦和摄政王召公奭,作了一个历史上的重大决定:分陕而治。这个“陕”的分界线,是在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境内的“陕塬”。《史记·乐书》有“五成而分陕,周公左,召公右”的记载,当时周公旦和召公奭分工合作,周公旦负责管理陕东新收复的土地,防止当时还有些实力的殷商遗族叛乱,保证政治的安定

为什么有陕西却没有陕东



统一。召公奭则负责陕西周朝原来的旧土地,大力发展农业、提高经济基础,加强国家力量。据说,当时殷商遗族确实曾经发动过一次叛变,殷商王族勾结周朝的管叔、蔡叔,试图推翻周公旦的统治,周公旦在重重压力下平定叛乱,流放了管叔、蔡叔,稳定了陕东这块区域。之后周平王迁都洛邑,并且在这里继续周朝的统治。而周公旦在平乱之后,改封了纣王庶兄微子启,将封地定在了商丘,根据商朝的宗祀,定国号为“宋”,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。

陕县作为“分陕而治”的分界线,在当时就叫“陕塬”,东周时期叫“陕邑”,也就是现在河南境内的陕县,可以说当时分割的区域比我们想象的要宽广得多。而“陕西”的叫法,则是在“分陕而治”的决策出现多年之后,秦朝迁都咸阳才有了。所以,陕县要比陕西来得更加久远。而作为当时的分界中点,陕县没有被纳入陕西地界,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,再加上后来我国经历了各个王朝不同的区域划分方式,陕县就成了“陕西”隔壁省河南的一个县区。但是不容否认的是,陕西名字的由来和陕县不容分割。

为什么陕东会消失了?有了陕西为什么没有陕东?这就和当时的政治及历史有着密切联系。我们知道了陕西西部是周朝的旧部落,属于原来的土地,那么在陕的东边就复杂多了。周朝在收复了商朝之后,扩大了自己的土地,并且不断扩张,在继续平乱的同时,还收复了之前附属于商朝王族的一些小部落,因此地图板块不断扩大,控制区域延续到了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等。这些地区已经跨越他们板地太远,如果用“陕东”来作为区域总称,显然已经不合适了。特别是在元朝之后,还采用了“行省制”,加入了地理概念,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岭南、关东这样的地理划分方式,自然“陕东”就更加不可能出现了。

陕西这个叫法第一次出现是在宋朝的时候,陕西以前还叫作“秦地”,是因为当时西周后期,秦始皇的祖上子非替周孝王养马有功,周孝王就将“秦地”封给了子非,也就是现在甘肃天水。之后犬戎攻破镐京时,秦襄公带领军队攻打了犬戎,并且帮助周王迁都洛阳,因此周平王就封秦襄公为诸侯,将当时陕西岐山以西的地界封给了他。就这样,秦襄公开始统治陕西部分土地。由于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,在诸侯之争中处于上风,因此,历史上很多人也将陕西称为秦。到了宋朝的时候,朝廷在这个地方设置了“陕西路”,历史上便开始了陕西。

钩沉

花庙“花”几许



“花庙”是船帮会馆在当地的俗称。到过陕南丹凤县城的人,想必对这座古建筑并不陌生。它位于县城西南一隅,占地三千多平方米,始建于清。丹水长流,在丹江北岸它已风雨挺立了二百余年。新中国成立后,曾几修葺,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,也是当地珍贵的文化遗产。由作家贾平凹先生手书的馆名,拙朴庄重,使历史遗迹融入些许现代文化气息。

清末,龙驹寨商行分为盐帮、马帮、青瓷帮、船帮等,其中船帮地位最低。有史料称:清嘉庆二十年农历六月初六逢会,船帮因风雨阻隔,未及洗脚匆匆到会。其他帮会便诬称船帮是“花腿子”“下贱帮会”,借机侮辱刁难。被激起义愤的船帮,当即邀约所属舢舨和搬运工,议定从每一件运送货物的报酬中抽三个铜钱,集资兴建自己的会馆。

光绪十七年,会馆终于建成投入使用。规模庞大,气势恢宏。船帮祭祀、聚会,帮员娱乐、往来食宿等,从此有了自己体面的场所。帮会迅速得以壮大,社会地位和商界影响力显著提升,再也不用看人脸色,受人欺辱了。

会馆“兼具南秀北雄”之誉,建筑精美,宏伟华丽。其内现保留戏楼和大殿各一座,戏楼在南,大殿在北,两相对峙,

风雨相伴。土木结构的戏楼高27米,做工精细。正面木雕楼透雕,刀工细腻人物、精品荟萃,山水人物、车马仪仗、楼阁亭台、鸟兽草木等无所不雕,形神兼备。大禹耕田,文王访贤,囊萤映雪,赤壁怀古等数十典故,数百人物栩栩如生。即便是科技水平在各个领域突飞猛进的今天来看,依然堪称“一绝”,令人叹为观止,过目难忘。而另一面,即会馆的门面,雄壮霸气,彩绘、雕塑图案突现两侧对称之传统风格,同样精美绝伦,独具匠心。可见,“花庙”这一称谓,理应专属于花戏楼,不知何时却成为整个船帮会馆的代名词。

尤其是在“和声鸣盛”题额两旁,由八组浮雕人物组成的那副画卷,随着岁月流逝,为后人留下了耐人寻味的难解之谜。2012年,当地政府一度对外发出邀请,“破译出花庙奇联者,可得一笔数额不菲的现金奖励”。那时,我也曾兴致盎然,几次前往流连于戏楼前浮想联翩,望能豁然顿悟;还把浮雕对联的各个细节用相机拍下来,在家反复看,苦思冥想,绞尽脑汁……现在想来,对于这个全国那么多专家学者都未能破解的百年之谜,我简直就是不自量力,枉费心机。

据说全国有“花戏楼”之称的建筑有

两处,一处是被称为北戏楼的丹凤花庙。另一处是安徽亳州的南戏楼。两座戏楼,一大一小,南北对望,遥相呼应,均以“花”字著称于世。体现出我国建筑文化,南北融合统一,又略有不同,各具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。

而今,我们虽隔三岔五就路过花庙一回,却有点熟视无睹的感觉,脚步很少踏入其中。除非有朋自远方来,才陪伴着去转转。当地政府部门、社团组织等多方人士,倒是常人内探访古迹,追溯历史,传承文化;还有许多外地朋友,慕名接踵而至,便不至于使它显得过于冷清。资料记载,自春秋战国始,丹江航道即为“贡道”;为建都长安之历代王朝的主要补给线,百艇连楫,水走襄汉,热闹非凡。于是有时,我满脑子都在疑惑一个问题:而今的丹江上游丹凤至商州段,早夏常有断流现象。难道古时,就一直江水爆满,航运畅通?

客观地说,若跟那时相比,花庙恐怕无论如何还是落寞冷清了许多。不过,就像一位历经沧桑后居家休养的老人,或是一位道行高深的隐士,不管尘世如何繁华与萧瑟,它都始终不急不躁、内心平和,静默于时光与烟雨之中,仿佛在时刻倾听着,船帮当年的兴盛于繁华…… □王璐

西安红色地标之一——革命公园

西安市革命公园位于西安市新城区西五路53号,占地面积10.4公顷,公园始建于1927年3月,是西安城区最大的一处革命旧址。主要纪念性建筑有革命亭、忠烈祠、东西大家、东西烈祠、王泰吉王泰诚纪念碑、张季鸾纪念碑;刘志丹、谢子长、杨虎城雕像等。2019年西安市革命公园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2020年被陕西省文物局列入“陕西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”。

1926年,在英、日帝国主义支持下,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东山再起,吴佩孚委派刘镇华为“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”,柴云升为前敌总指挥,率10余万人的部队进攻陕西。刘镇华部队所到之处,烧杀抢掠,无恶不作,激起了陕西人民的极大愤慨。当时,西安城的守军为国民军第二军李虎臣部、国民军第三军杨虎城部、国民军第二军卫定一,共约万人。李虎臣、杨虎城率西安军民英勇战斗,粉碎了刘镇华的一次次猛烈进攻。11月28日晨,西安解围。在近8个月的守城斗争中,西安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,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1927年3月,为纪念西安围城期间死难的军民,于右任先生在西安城内主

持修建了革命亭、忠烈祠、东西大家等,奠定了基本格局。

建园之初公园面积较大,1928年因开拓西五路,公园被划分为南北两部分。二十世纪50年代南边部分建成西安市体育和人民大厦,北部即为现在的革命公园。1952年为纪念王泰吉、王泰诚烈士,在西南角建立了刻有烈士传略、烈士刑前遗诗的纪念碑,原陕西省及西安市的党政领导均为其题词。1993年在杨虎城将军百年诞辰之际,园内修建了将军戎装铜像。2005年、2008年,刻有毛泽东题词的刘志丹烈士、谢子长将军雕像分别落成。2013年6月,报界宗师张季鸾先生纪念碑在原址上恢复重建。

公园采用中国传统北方园林造园手法,对称式中轴布局,规则式与自然式相结合,构筑出自然、生态的园林景观格局,既突出庄重、肃穆的纪念性特色;又形成自然、生态、休闲的纪念性文化公园的景观特色。



谢子长雕像

革命公园的建成,填补了西安市近现代红色革命纪念性城市公园的空白,是一座集纪念性文化公园、革命旧址和公众游览、观赏休憩的多功能城市公园,它既承载着西安近现代革命历史,也是西安红色地标之一,也是北方近现代园林中典型的纪念性文化公园,是众多市民游客和青少年缅怀革命先烈、接受红色文化教育和参观游览的重要场所。 □秦丹华

康熙与刘灏

人物

关注刘灏的生平事迹,因为他是我的同乡先贤,把这位曾经的芝麻官和康熙大帝放在一起做文章,则是因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,他们君臣之间有着不寻常的际遇。

刘灏,陕西泾阳社树村人,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进士,而后庶吉士,编修,日讲起居注官,湖广乡试主考,长芦巡盐御史……也算稳步前进,仕途顺畅。刘灏入翰林院时,其弟刘涵已是翰林院检讨,时人称美,有“关中二刘”之说。县志记载:刘灏“诗文书翰,推重馆阁间”。看他与文化名人宋举、赵执信、查慎行、史蕉饮等人的诗文唱酬,为著名肖像画家禹之鼎的《枫木图》《张鲁翁像》题诗墨迹(现存故宫博物院),即可见其确是当时京城文化圈的名人,亦可证志书所言并非溢美。

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康熙四十年(1701年)初,三年一次的“大计”(官员考核)开始,结果数十人被罢官,任期将满的河道监察御史刘灏也在其中。按考核标准,官员被评定为八类,即:卓异、贪酷、不谨、罢(疲)软、才力不及、浮躁、老和疾。刘灏属哪一类、什么罪过?史无明文。县志说,“以罢误罢”。罢误,也作“误罢”“挂误”,意为因小过被连累而受处分。刘灏《神道碑》则说:刑部、都察院和大理寺当时给出的定性为“用法不当”。由此猜想,刘灏应当是因为“不谨”而跌倒。

世间事,真有不测的时候。有些事,合法而不合情理;有些事,合乎情理却不合法。官场上,等级森严,文法繁缛,稍不谨慎就可能踩了什么连高压的红线,也或许,城门失火而殃及池鱼。刘灏正是这样的不幸者,一着“不谨”,他的人生便一下子跌进了谷底,委屈也罢,追悔也罢,都为时已晚,三法司定的案,谁能帮你改变命运呢?

有一个人能,那就是皇上。刘灏肯定没做这个梦,但皇上却主动发话了:刘灏不必返回原籍,留下来编修《广群芳谱》吧。不能不称赞康熙的清醒和透彻:刘灏有才而勤勉,因“不谨”而罢,不是有意犯法,不存在政治道德问题,为什么不能人尽其才为国所用?不仅可用,且应当重用。《广群芳谱》是已进行多年的钦定工程,如果让刘灏以一个“废员”身份,像雇来的誊抄工一样缩手缩脚地跟在别人后边劳作,便很难充分发挥其特长。于是,他改命编辑组负责人汪灏为山西提督都学政,让刘灏以昔日官员的身份接手。一是皇上所赏识的人,一是不愿舍弃的人,一个提升,一个“返聘”,实在是各得其所,两全其美。

在最绝望无助的时候,忽闻天外纶音,刘灏怎能不感激涕零,怎能不竭忠尽智以报不弃之恩!康熙心里清楚,此时的刘灏,不用扬鞭自驱驰,遂以正式编修待之,南巡时,不止一次让刘灏随驾扈从。刘灏作有《大驾南巡》诗八首,记其事,歌其功,由衷表示“木经枯后复如春”“相期同作报恩人”。

康熙四十七年(1708年),《广群芳谱》完稿,皇帝看后十分满意,亲自写了序言,并传口谕,着刘灏就《广群芳谱》的成书经过写一总结性的文章,“许列头衔”。刘灏闻言,受宠若惊,“对玉简以悚惶,瞻彤墀而踊跃”,很快以“原任掌河南道事河南道监察御史加七级”的身份献上一份《广群芳谱》刊成进呈表》。《广群芳谱》面世时,《进呈表》被置于卷首御制序文和《群芳谱》原序之后,位居“序三”。并且,皇帝还让吏部为刘灏记录修谱的劳绩。当时舆论普遍认为,皇上重新起用刘灏的日子不会太远。

起明年,《康熙字典》的编纂工程启动,刘灏为三十人组成的编辑部成员之一。不消说,刘灏必是勇于负重,尽心尽力,县志说他“校阅披览,考订精确”,当属实情。

谁也没有想到,一年半后的康熙五十年十月,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发。这是康熙年间一起重大的文字狱,株连甚广,刑部等初审后上报的判处意见中,原尚书韩菼、侍郎赵士麟、御史刘灏等三十七人,仅仅因为平日与戴名世有诗文往来亦被“别议降调”。

这对刘灏无疑是要命的打击。十年前“以罢误罢”,数十载之功毁于一旦。好在皇上弘恩有过,才从绝望中抬起头来。近几年,倒是甚得皇上关爱,前途似有光明闪藏。但他毕竟还是个“临时工”,内心既满怀美好希望,也有驱之不去的浓重阴影。康熙四十六年重阳节,他在和礼部尚书宋承的登鹿卢阁诗中写道:“荆榛台下吊燕昭,风雨云中怀魏尚。”既是歌颂对方,也是自己的内心写照,期望中透出隐忧。几乎同时,在为禹之鼎所画《枫木图》题诗中则不禁倾泻了浓浓的悲观情绪:“白华既已无颜色,头上簪纓亦得,便当被发痛哭谢人间,南山之南北山北!”而今,又身陷有口难辩的文字狱。好个“降调”,对已丢官十年的刘灏,这判决简直就是讽刺和羞辱!何官可降?何地可谪!真要执行,那就只有被押解回泾阳老家,交当地管制。这叫刘灏如何面对家人?如何面对家乡父老?

如此忧愤,击溃了他的精神堤坝,成十年呕心沥血已生疲羸的躯体经不住这样的崩塌,不久,五十一岁的生命便黯然萎谢。

这是康熙想不到的。推测,《广群芳谱》成书之后,康熙便有过为刘灏复职的念头,但又觉得时机尚未完全成熟,待《字典》竣工后再说吧,不意却成遗憾。“上悯其劳,命弟(刘)泌扶掖驱驿归。”同时,追赠刘灏为通议大夫。给予通常只有三品高官才能享受的荣誉,等于是公开为其恢复名誉。

康熙,一代雄主。一方面,他爱才惜才,对文化人实行怀柔政策以笼络人心,许多人才得到重用。一方面又大搞文字狱,钳制舆论,打压汉族士人的抵触情绪。金杯白刃,两手都强。刘灏在绝望时得到过阳光般的抚慰,又在一心效力时落入莫须有的网罗。君臣间恩怨相济,福祸交缠,耐寻味。 □冯日乾

绿釉陶灶

年代:汉代
收藏单位:铜川博物馆

灶体平面呈马蹄形,前端有平出沿,顶面有圆形灶眼,周围模印灶具,灶尾端有圆锥形烟窗。灶前端有方形灶门,左侧一人执物作烧火状,右侧置一陶罐,边缘一周菱形纹,投火灶孔顶部饰“工”字形纹。釜方唇,平沿,敞口,斜折腹,平底。甑方唇,平沿,深斜腹,小平底,底有算(bi)孔。灶体、甑、釜外壁施绿釉。

陶灶最早见于关东秦墓,为汉以来主要明器,常与陶井、陶仓等成组出现。秦至西汉早期灶为立体长方体,灶面中间有一个大灶眼,上置甑、釜类炊具。灶前有门后设烟窗。西汉中期前后,灶前后出沿,大灶眼出现圆模印灶具,灶尾端沿刻有纹饰。西汉晚期,灶面增大,有两个灶眼,并模印出各种食品及勺、钩等炊事用具。东汉后,出现3—5个灶眼,灶身增大,前壁高出灶面,灶烟窗作葫芦形或亭形,装饰复杂,有的灶面刻出一条或两条大鱼,有的在灶门旁刻画出人物等。东汉晚期,陶灶逐渐衰落,灶面虽有1—4个灶眼,但原来的灶具变成了模印的纹饰,烟窗也如此。 □何希阳